

繁體版序

(一)

我的人生道路和求學經歷，與國家的命運同步。

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母親都是國立復旦大學畢業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編輯。童年生活平靜快樂。1962年，因家庭出身問題，父母不能在中央機關工作，被下放到河北石家莊市，父親在河北師範大學，母親在一個中學，當了教師。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家經歷了噩夢般的劫難。母親被紅衛兵打死，父親被打成「反革命」。我成了「黑五類狗崽子」，被趕出校門，1969年到一家街道小廠當工人。在那動輒得咎的日子裏，不敢有社會交往，只有悶在家裏找些書看。文學書都被當作「毒草」抄走了，只剩下《史記》《資治通鑑》等歷史書。實在沒得看，把舊版的《辭源》也看了幾遍。那時談不上什麼志向遠大，只是打發寂寞的時光。

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弟看到了希望。大家紛紛找出高中課本，抓緊複習。我也走進考場，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成績過了線，但在政治審查時被刷了下來，理由是「歷史不清楚」。當時政治空氣已有緩和，不再要求家庭出身，只要求歷史清楚。我家當時享受著「反革命」的待遇，卻沒有組織上的文字結論，

就叫「歷史不清楚」。眼看別人歡天喜地去上學，我卻被拒之門外，痛苦之餘也下定決心：以後不放過任何一次考試的機會，別人能進大學讀書，我也要讀書。

1978年2月，國家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規定：雖然沒讀過大學，具有同等學力的自學人才也可以報考。我找工廠領導開了張證明書，有了報考資格。我根本沒什麼專業，看到山東大學歷史系的魏晉南北朝史專業多考一門古代漢語，我覺得適合，於是就填上了。在兩個月的準備過程中，我拿著父親的借書證，在河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裏借到了王仲學先生的全部著作，又把山大的《文史哲》雜誌瀏覽了一遍。對導師的學術特點和山大的學術流派，有個基本的瞭解。

進考場的時候，我是個地道的醜小鴨。考生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高校的教師和科研幹部。而我穿著粗糙的工人裝，顯得很不協調。但是考起來，我的答卷比較上路。7月，我獲得到山東大學複試的資格。在口試的考場上，第一次見到了王先生。他鶴髮童顏，風度翩翩。先生瞭解我的身世和學習經歷後，深表同情。他沒告訴我複試考了第一，只是笑著對我說：「回去等消息吧。」

10月，等來的不是錄取通知書，而是一封冷冰冰的電報：「因名額有限，不能錄取。」我意識到又是政治原因。那種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沒想到文革已經結束，我還在承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仿佛否極泰來，胡耀邦開始主持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母親的案子被石家莊市委給予了昭雪。一環扣一環，父親也得到了平反。我拿著兩份蓋公章的證明，再次到山東大學申訴。王先生表示一定要錄取我，山東大學黨委書記孫漢卿文革中也曾遭受殘酷迫害，聽了彙報後激動地說：「他家受了這麼多苦，本人成績又好，為什麼不錄取？給他重新辦手續！」一聲令下，學校為我重新起草報告，逐級上報到國家高等教育部；歷史系為我準備了床位和課桌，讓我和已經錄取的研究生一起學習，不致脫課。我就以這種特殊身份度過了第

一學期。當公文旅行回來，錄取通知書發到手裏，已經是1979年的寒假。在文革後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中，我是最後一個入學的。

從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到大學研究生，是我人生中第一個重大轉折。當我拿到錄取通知書時，根本沒有范進中舉的狂喜。我深深感到：個人的努力和機遇固然重要，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就沒有我個人的前途。我的命運、家運和國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擁護改革開放，希望國家安定發展，希望自己的努力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

(二)

我的第一位導師王仲華教授是章太炎晚年弟子。作為歷史學家，王先生首先是一位愛國者。太炎先生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深惡痛絕，臨終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告誡子女和學生絕不能當漢奸。抗戰時期，王先生輾轉流亡雲南、重慶。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手頭只有一部《資治通鑑》，躲空襲警報時也帶在身邊。苦難的生活，使他對亂世有切身的體會，也為國家民族的命運擔憂。

歷史學家最重要的是史德。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出不朽的學問。而看風轉向、趨炎附勢的「學者」看似聰明，只會讓後人嘲笑。1973年王先生在北京典校二十四史，正逢「評法批儒」運動。有些「學者」到處作報告宣傳「儒法鬥爭」。先生對這種歪曲歷史的行為嗤之以鼻，寫了《百鳥朝鳳》一詩，將那些鼓吹者比之為武則天登基效勞的「北門學士」。相比之下，王先生不僅沒有去做那種事情，而且從開始就鄙視、抵制，不與其同流合污。經過歷史和實踐的檢驗，先生的品德更令我們欽佩。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學術道德，是我跟隨王先生的最重要收穫。

1985年，我考上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跟隨譚其驤先生。復旦大學的風氣更為開放，當時又處在思想活躍時期，使我的眼界大為開闊。歷史地理雖然與中國古代史相關，但更強調對地理環境的理解。比如黃河如何改道，疆域如何伸縮，民族如何遷徙，古都如何形成，一套《中國歷史地圖集》隨時查閱。我考察了南方八省，山川地貌，風土人情，把我過去的知識變成了立體的。譚先生是一位嚴師，學識淵博，眼光銳利。他寫的論文語言淺顯，寓意深刻。他講課一口京白，抑揚頓挫，引人入勝，我受益匪淺。但是我的論文寫作並不順利，研究唐朝邊區少數民族政區的〈唐代羈縻府州研究〉，初稿寫得平鋪直敘。譚先生著急，說這不是論文，是寫教材。怎麼辦呢？譚先生強調一句：「你研究什麼寫什麼。」就這一句點撥，使我明確了方向。於是我從問題入手，一個個加以論證，幾乎推倒重來。

在科學研究上，譚先生同樣是一個非常正直、嚴謹的學者。他強調實事求是的學風。特別在中國疆域沿革變遷的問題上，一定要用事實和歷史依據說話。在研究唐朝邊疆地理時，我就遇到這個問題。唐朝的羈縻州曾經設到了中亞地區，能不能說它們在歷史上曾是中國領土呢？我根據史料，解讀了它們的設置時間、管轄程度和與中央政權的關係，指出它們之中有的一度屬唐朝管轄，有的則只是名義上的歸屬，並無實質意義。我的研究得到了先生的認可，在畢業答辯時，譚先生在評語中寫道：

唐代羈縻州是一個很複雜很難搞清楚的問題。要搞清楚它一方面必須花很大的力氣，另一方面必須絕對忠於史實，不受任何政治思想的影響。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古人、近代人直到當代人，長期以來史學界凡涉及這方面的述作，都極不完備，這為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歷代疆域變遷史

研究留下了一個大缺憾。劉統同志這篇論文不能說把這個問題完全搞清楚了，但他的成就無疑大大超越了前人，成為研究這個問題的一個顯著的新里程碑。

論文在分析論述上，可以說是戒絕了幾十年來籠罩史學界的「左」風，憑史實講話，做出了許多正確的論斷。如其中的第七章第一節，指出羈縻州的情況，因部族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差別很大。不能說是凡設置了羈縻州的地方便有唐一代都是唐朝的領土。其中有些短時期是，長時期不是。有的一直就只是一個名義，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實質上的政治隸屬關係。這些話看似平凡，但在邊疆史地研究史上卻是非常大膽、可貴的突破。

十年大學的經歷是寶貴的。人生中能遇到一位名師，已屬三生有幸。我能得到兩位名師的指導，為我後來幾十年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不僅得到了學問，更重要的是學到了老師的人生價值觀。我一直以兩位老師為典範，勤學不怠，堅持獨立的學術立場和觀點，力求做出有價值的、原創的研究成果。

1988年從復旦畢業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分配到軍隊，來到北京西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擔任《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學科的責任編輯。工作倒是對口，但軍隊的紀律使我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做學問。怎麼辦呢？當時與我同事的是茅海建少校，他告訴我：軍事科學院最有價值的收藏是戰爭年代的歷史檔案。如果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去借閱。我看到這些堆積如山的檔案，猶如發現了一個寶庫。許多過去不知道的事情、不清楚的問題，讀了當年的電報、文件，就有了確切的答案。不久，譚先生來北京開科學院院士會議，我去拜訪時講了一些閱讀歷史檔案的所見所聞。譚先生激動地站起來大聲說：「你要把它們全記下來！」導師允許我改行，於是我就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和軍史的研究。

(三)

中共黨史和軍史，我過去僅限於書本知識。到了軍隊，才知道這是一門大學問。

我到軍事科學院工作時，全軍編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接近完成。在編寫百科全書的過程中，發現中共黨史和軍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以前都沒有深入研究，因此產生了許多重大政治和學術問題。例如對中共黨史上一些重大鬥爭的結論、一些歷史人物的評價、平反恢復名譽，一些現時存在的學術爭論等等。這些問題不同於地方學者的個人研究，需要中共中央高層來做結論，這就產生了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先要研究事實，然後寫報告請示上級批准，然後在文字上如何表述，都是我這個書生過去沒見過的。這就不僅要研究學術，更要瞭解共產黨的歷史和政治。

這時，我又遇見一位良師，就是《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第一任領導奚原老先生。作為三十年代的文化青年，他來到延安，加入抗日軍政大學，與毛澤東有面對面的交往。後來成為新四軍4師和華東野戰軍的大筆杆子，許多文件都是出自他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轉業到上海，曾和譚其驤先生搭檔任復旦歷史系書記，創辦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後來到北京與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編寫中國現代史稿，文革前又回到軍事科學院。他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一位學者。他離休後，我經常去上門找他求教。一個個夜晚，他對我娓娓道來。歷史上的一份電報、一份文件，產生的背景，內容的核心意義，他都瞭如指掌。檔案在他眼裏都是活的歷史。他經歷的黨內重大事件，自己的坎坷經歷，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啟發。

在軍科工作期間，許多老研究員都是我的良師。他們經歷過戰爭年代，有在軍委總部機關工作的經歷。講起過去的歷史和典故，如數家珍。許多重大事件，他們幾句話就點到實質。他們講的故事都是那麼鮮活、那樣驚心動魄。我順著他們提供的思路再去看檔

案，很快就能從大量的資料中梳理出一個清晰的線索。軍事科學院是全軍最高科研機構，我們經常看到中央的文件和傳達，還經常聽中央領導人的內部報告。這些經歷使我認識到：要想真正瞭解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必須有在高層機關工作的經歷。這樣才能真正瞭解中共的組織體系是怎樣運作的，中央的決策是怎樣做出的，歷史的傳統是如何演變的。這樣再去研究中共黨史和軍史，才能避免盲目性和外行的猜測，準確地把握研究的方向和重點。

在軍科工作的十五年，我的愛好就是在史料的海洋中暢遊。每天完成工作，我就到圖書館借出一堆資料，晚上在辦公室裏專心閱讀，日復一日。因為沒有在大學裏必須年年發表論文和提職稱的壓力，可以安心做自己感興趣的學問。王先生生前囑咐我：良工不示人以璞，四十歲以前不要出書。我這時才真正感受到學無止境的真理。歷史研究必須有長期的積累，研究水平是隨著閱歷的豐富、知識面的拓寬逐漸提高的，急功近利是不行的。後來從事寫作，我才真正從多年的積累中受益。

(四)

從事中共黨史和軍史的研究，我首先從一些重大問題入手。

在編輯百科全書時，一些重大政治性問題引起我的關注。例如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1935年9月9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給右路軍負責人陳昌浩發出密電，「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葉劍英參謀長向毛澤東通報了這一情況，在爭取四方面軍領導人無效後，毛澤東決定率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這是長征中的分裂，也是中共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的焦點。但是在中央檔案館我們沒有查到「密電」的原件，因此有人否認「密電」的存在。百科全書是官方修撰，在重大問題上必須有統一的結論。在聶榮臻署名的「中國工農紅

軍第一方面軍」條目中，有「密電」的敘述。而在徐向前署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詞條中，則只說「張國燾公開進行分裂活動，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的決定」。迴避了「密電」的說法。在一部百科全書中有兩個不同的觀點，是很罕見的。這使我意識到：黨史軍史中的許多重大問題，不是僅靠學術研究能解決的，其中有複雜的政治因素、歷史因素在起作用。

那麼，我能不能寫出公正客觀的歷史呢？我的第一本專著就是《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書稿寫成後，命運頗為曲折，兩家出版社都以選題敏感等理由退了稿。在抽屜裏擱了幾年，廣西人民出版社江淳社長有意出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張樹軍研究員對書中一些敏感問題作了修訂，終於在2004年第一次出版。雖然刪去了原稿幾萬字，但總比出不來好。又過了十年，三聯書店有意再版此書，在2016年紀念紅軍長征七十週年之際，三聯書店推出了新版《北上》，在讀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大家公認這是研究長征和西路軍的一部客觀、公正的著作。

《北上》寫成後雖然遲遲不能出版，但沒有影響我的情緒。王仲華先生的著作，都是擱了二三十年才出版，我還年輕，怕什麼。於是我又轉入解放戰爭研究。解放戰爭的檔案非常豐富，東北的資料尤其有特色。一來是東北的戰役打得激烈精彩，二是當年中共中央把大批精英幹部派到東北，寫的材料質量特別高。以前寫解放戰爭，都是以部隊或戰役為主線，比如第一野戰軍戰史、第三野戰軍戰史、淮海戰役史等。我要拓寬視野，以戰區劃分來寫。東北解放戰爭不僅是軍隊作戰，還有根據地建設、剿匪、土地改革、軍事工業建設等多方面，這就把戰爭的面拓寬了。而且我把國共雙方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來寫，看雙方統帥如何運籌決策，這樣的全面敘述，才能讓讀者對戰爭全局有一個真正的理解。

《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完成後，我託人交給了人民出版社。郇中建主任看後，認為很有特色，決定出版。《東北解放戰爭紀實》於

1997年出版，這是我的第一部面世的專著。出版後社會反響很好，出版社認為以戰區寫解放戰爭的方式很新穎，讓我繼續寫。我又陸續寫了《華東解放戰爭紀實》和《中原解放戰爭紀實》，最後和其他三本書組成了一套解放戰爭系列。在寫作過程中，我突出了兩點：一是大量引用第一手史料，言必有據。二是注重刻劃指揮員的細節。林彪、劉伯承、粟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將領，他們運籌指揮各有特色。用他們的電報、講話來再現他們的形象，研究他們的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對不同的讀者都會有幫助和啟發。

在寫作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風。首先，我把古代史的研究考證方法引進現代史的研究中。傳統的中共黨史、軍事著作多數是單位集體編寫，重理論，具體史實少。我寫黨史軍史，首先注重故事和細節，每個戰役都寫出完整的來龍去脈。如果按照所謂「學術規範」的寫法，必然要進行大量的繁瑣考證。我沒有按那種寫法，而是把考證的過程融入我的敘述之中，給讀者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我篩選大量史料、去粗取精，經過自己的研究之後總結出來的。

寫書是給人讀的。官修正史那種正規、嚴謹的語言，讓一般讀者很難讀進去。一些學術著作晦澀的語言表述也讓一般讀者難以接受。我力求用通俗生動的語言，還原出一個個完整的故事。司馬遷的《史記》為何千古流傳，因為他筆下的項羽、劉邦、韓信、張良是一個個鮮活的形象，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能讓讀者喜歡的書才是好書。我要把每一本書都寫得通俗生動，形成自己的風格。把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融入敘述之中，盡量不評論，少下斷語，留有餘地。讓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己作判斷。

(五)

2004年從軍隊退休後，我受聘到上海交通大學。此時我無需再為評定職稱去奔波忙碌，得到相當大的自由空間，可以到處走走看看。研究軍事，總要到戰場實地看看，方能避免紙上談兵。到一些歷史遺跡考察時，我突然發現歷史資料與實地考察又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瞿秋白這個人物，一會兒捧為革命先烈，一會兒被打成叛徒，何以如此翻覆？到常州看他的故居，才知道因為家境貧困，母親被迫帶他到宗祠棲居，受盡族人白眼。母親自盡，憤而革命，幾年間就晉升到黨的最高領導人。到上海武定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舊址，才知道他被共產國際拋棄，從高層一頭栽下，生活無著，求助魯迅，以稿費為生。調往瑞金之後，長征前再次被拋棄，輾轉回上海途中在長汀被捕。按過去的描述，他受盡國民黨的酷刑，堅貞不屈，從容就義。當我來到福建長汀貢院，看到他的囚禁地，原來是個小院，還有花園，住得比一般人還好。才知道宋希濂等國軍軍官對瞿先生十分尊敬，經常有人陪他喝酒聊天，在這種環境下，瞿秋白才寫了〈多餘的話〉。但是他沒有被軟化，直到蔣介石下令，他從容瀟灑地走到西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了。

如此看來，一個人絕不是非紅即黑，而是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他激情過，浪漫過，頹唐過，自省過，短暫的人生居然如此跌宕起伏。把這些故事寫出來，不是很精彩嗎？此後，我只要有空，就出行遊歷，到那些故事的發生地去探查考究。在江西永新三灣村的大樹下，我感受到毛澤東當年帶著一支筋疲力盡的隊伍，還不知道不能在井岡山棲身。他改編隊伍，支部建在連上，不是去落草為寇，而是要摸索出一條前人沒走過的革命之路。走到這裏的人，才是最堅定的戰士。從井岡山到瑞金，今天走高速公路，一條條深深的隧道穿越一座座大山，想當年毛澤東和紅軍是用雙腳一步步走過來的。創業何等艱難，他卻寫出「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詩句，浪漫

中蘊含的氣魄，讓你敬佩不已。雄偉的太行山深處，至今還是道路崎嶇，行車艱難。類似桃花源的黃崖洞，入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峽谷，進去是有田有水的田園風光，八路軍就在這裏辦兵工廠，生產槍支手榴彈。為什麼能持久抗戰，就是共產黨善於利用崇山峻嶺、深山老林，讓佔據鐵路公路的日軍用不上現代交通工具，只能望著大山嘆息。

十幾年來，實地考察成了習慣。靠著當年學歷史地理的基礎，我每年都要去一些發生過重大歷史事件的地方考察，獲得許多新的收穫。最重要的是讓我回到了歷史現場。研究歷史有兩種方法：一個是「事後諸葛亮」，知道了結果再來總結提高，仿佛人有先知先覺，穩操勝券。一個是回到歷史現場，還原當時的原貌。你怎麼知道明天是生還是死？你該向何處去？在這個關鍵時刻，才考驗人的智慧和定力。設想與歷史人物同在，我們會怎樣抉擇？這樣感受和比較，對歷史的領悟就更真實，書寫的歷史才更可信。

(六)

最後來談談這本《尋路》。這原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約稿，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記錄中共早期歷史的專著。原名叫《火種》。這本書的框架是王為松社長和責任編輯們和我共同策劃的。考慮到中共建黨的書已經出過很多，如何寫出新意？必須要拓寬視野，從中國近代史的範圍去探索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各種條件。

我要把這本書寫成一個「尋路」的過程，寫20世紀前三十年風雲激盪的中國史。世紀初的辛丑條約、庚子賠款，把中國拖入了災難的深淵。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敗，使得中國的仁人志士都要推翻它。於是就有了憤青和刺客，就有了革命黨一次次的起義。今天看起來這些行動就像以卵擊石，個人能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

個擁有軍隊的政權嗎？但這些革命者真的是一腔熱血，明知要犧牲，也義無反顧。他們的犧牲喚起更多人的響應，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封建王朝，迎來了共和的民國。

同盟會、國民黨人的缺乏凝聚力、內耗、渙散和種種弱點，使他們無法組建一個堅強的政黨，無力撐起一個共和國，政權又落到袁世凱這些軍閥手裏。幻想破滅後，先進的知識分子去尋找新思想、新主義，於是開始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喚起了全民的愛國熱情，一群革命青年脫穎而出，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懂得了聯繫廣大群眾，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長，也經歷了幼年、青年和壯年，也是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從理論宣傳到工人運動，從國共合作到武裝鬥爭，誰都沒有經驗，挫折和犧牲遠多於勝利。在血與火的實踐中，共產黨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毛澤東從井岡山到古田會議的經歷，為中國革命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這樣寫歷史，就能使讀者感到真實可信，就能讓讀者感受到歷史的發展是一步步來的，不是憑空而降的。探索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後繼，歷盡艱難完成的。如同一座大廈，是從一磚一瓦鋪墊積累而成的。

有了思路和構想，怎麼在一本書中體現呢？

第一，歷史要寫得真實生動，讓人讀得進去，就是要有故事。歷史是一個個人物和事件組成的。要真實地反映歷史，首先要注重第一手資料，從歷史檔案和當事人的記錄中去挖掘。近現代史的資料浩如煙海，怎麼選擇，怎麼編排，取決於你的洞察力。同樣讀文獻和檔案，一定要追求原始版本。在歷史研究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今天我們讀的《毛澤東選集》與當年發表時的原始狀態有很大差別。日本學者竹內實編輯的《毛澤東集》收錄了原始版本，並在上面做標記，讓你一看就知道刪去了哪些內容。這些刪去的內容，都是一些具體的事情，對瞭解當年的歷史真相非常有價值。我在寫

井岡山這段時，基本上引用了原版，表現了初期革命探索逐漸成熟的過程。

本書的寫作主要依靠歷史檔案。許多檔案整理者的辛勤勞動為我提供了方便。上海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整理出版的建黨先驅的文章、日記、共產國際檔案和租界檔案，為我研究建黨過程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本書寫作中，北京市檔案館又出版了五四時期檔案，為我提供了新材料。學無止境，隨著歷史資料的不斷推出，必將促進歷史研究向新的高度和深度前進。

要真實地再現歷史，還要實地考察。我到湖南瀏陽，從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澤東初出茅廬險些送命的驚險。從江西尋烏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才能感受什麼叫「創業艱難百戰多」。從福建上杭蘇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才能感受毛澤東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在賴坊村協成店毛澤東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想他在這麼偏僻的小山村裏卻在考慮中國革命如何走向勝利的問題，由衷佩服這些革命者的胸懷。這些感受，都是在書齋裏得不到的。

第二，歷史要寫活，就是要把人物寫活。20世紀初期的歷史之所以生動，就是因為當年的人物極有個性。愛憎分明，敢說敢做。我一向反對把歷史人物人為地拔高，給他們塗上一層層的油彩，把一個活人變成僵化的偶像。真實地再現他們的一舉一動，還原他們的真性情，真面貌，是本書追求的效果。任何人物，無論偉大還是反動，都不是單一的。他們的經歷和思想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是立體的。有正面就有反面，有優點就有缺陷。問題是他們的優點在歷史上發揮過先進作用，還是缺點起到過負面作用。陳獨秀就是一個優點和缺點都十分突出的人物，共產黨由他而起，也在他手裏遭受重大挫折。蔡元培在許多人筆下是民主之父，我也寫了他早年參加暗殺團，1927年首倡「清黨」。袁世凱在當皇帝之前，也要看到他執政當國的不易。章太炎是我太老師，雖然未曾謀面，我閱讀他的史料時，感受和魯迅一樣，一會「章瘋子大發其瘋」，一會「章瘋子居

然不瘋」。後來他退出政治，在蘇州講習國學。魯迅說他自己築牆，與社會隔絕了。那時我導師王仲犖是他門下學童，每天聽先生講訓話，章自己講得昏昏欲睡。聽到街上報童喊號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學生買報來，一邊看新聞一邊侃侃而談時政。原來他內心深處，還沒有熄滅革命之火啊！王先生的講述啟發了我，原來這才是真正的歷史。

看人看問題能從當年的環境和時代出發，就多了理解和寬容。有些事情就是突然發生的，火燒趙家樓，不就是青年學生臨時起意，幹起來了嗎？幾個人一商量，《新青年》不就辦起來了嗎？出席中共一大的時候，誰能想到後來的事呢？當年共產黨武裝起義的時候，誰有經驗和謀劃呢？還不是失敗的多，活下來的少。歷史就是這樣，有一是一，有二是二。這些個案綜合起來，就匯成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把這些真實的細節寫出來，讀者看了才覺得可信。

這本書獻給那些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奮鬥過、犧牲過的先人。想想他們當年都那麼年輕，如果不去當革命黨，不去拿起槍杆，也可能是學者，是成功人士。他們憑著血氣方剛，懷著一種理想和信念，義無反顧地獻出了生命。青史留名，永垂不朽，才是他們的人生價值。把他們寫下來，是我的責任。前人沒說清楚的，你把它講清楚。前人沒寫準確的，你把它寫準確。事情寫得越簡明越好，文字越平實越好。這樣，這本書才有存世的價值。

劉 統

2021年5月於上海